

农业外商直接投资 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

陈灿煌

摘要: 针对当前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难题,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出发,以 1981 - 200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首次运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两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且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加大吸引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在利用外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选择上,政府应当采取长期政策。

关键词: 农业外商直接投资 农民收入增长 脉冲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4 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3 255 元,28 年增长了 23 倍多。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1978 年为 343.4 元,2005 年为 10 493 元,28 年增长了近 30 倍)相比,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仍然较慢,收入水平仍然偏低。近年来,虽然党和政府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农业税以及推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等,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势头,但这些因素对农民未来收入增长的贡献潜力还有限,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阻碍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何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和比较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诸多颇有见解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金融发展论、城镇化推进论等。本文结合目前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特殊国情和农业本身的特点分析认为,解决农业投入中的资金短缺以构筑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应当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根据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梅勒的“资源互补”理论,投入农业的资源(资本、劳

动、土地、技术等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性。即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而其他互补的生产要素不增加,那么,前者的边际产出就呈递减之势,农业总产出的增加也就十分有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土地等要素较为丰富,资本却极为稀缺,若要提高农业原有要素的生产率并增加农业总产出,就应该大大增加资本的投入。同时,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 1953 年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实物资本短缺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即“农村资源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和农村地区的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由此进入恶性循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资本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资源互补论”和“贫困恶性循环论”都充分说明了农业投入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增长的必要性。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林毅夫,蔡昉等,2003),忽视农业的发展,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科技水平低、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受到限制。因此,加大农业投入是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要弥补中国农业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根据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的基本情况,仅依靠政府投资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明,Chenery、Bruno 和 McKinnon

(1962)的两缺口理论论证了资本从国外的流入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Romer (1986)和 Ethier (1982)的内生增长理论、Lucas (1988)的外部驱动增长学说均支持了外资能够引起经济长期增长的命题;Blomstron (1994)、Mina (2004)、Lute (2004)、Beata (2004)、Javorcik (2004)等学者用 OLS 方法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国内最近的诸多研究成果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陈浪南和陈景煌(2002)从总供给角度得出结论: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萧政和沈艳(2002)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沈坤荣和耿强(2001)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几年来,随着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的数额不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周维富(2000)、黄祖辉(2005)、綦建红等(2007)的理论研究表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还没有学者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就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当然也就无法知道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根据 1981 - 2004 年的统计数据,试图用协整理论对中国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以考察二者之间的交互响应情况及其响应路径。

二、变量与数据

在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中,农民收入增长作为内生变量,可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单位:元),即 PI。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外生变量可以用农业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单位:万美元),即 FDI。

本文分析所用的样本数据取自于 1981 - 2004 年的年度数据,农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82 - 2005 年)统计数据汇总计算得到,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2 - 2005 年),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PI)以现价形式表示,考虑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直接采用以 1981 年为基期(1981 = 100)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数。同时,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为 LnPI_t、LnFDI_t,其相应的差分序列为 ΔLnPI_t、ΔLnFDI_t,相关数据见表 1。

表 1 PI_t 指数、FDI_t、LnPI_t、LnFDI_t、ΔLnPI_t、ΔLnFDI_t 数据表

年份	PI _t 指数	FDI _t	LnPI _t	LnFDI _t	ΔLnPI _t	ΔLnFDI _t
1981	100.0	1 120.0	4.605170	7.021084	-	-
1982	119.9	1 543.0	4.786658	7.341484	0.181488	0.320400
1983	136.9	1 777.0	4.919251	7.482682	0.132593	0.141198
1984	155.5	7 880.0	5.046646	8.972083	0.127395	1.489401
1985	167.6	12 631.0	5.121580	9.443909	0.074934	0.471826
1986	173.1	10 437.0	5.153869	9.253112	0.032289	- 0.190797
1987	182.0	12 496.0	5.204007	9.433164	0.050137	0.180051
1988	193.7	20 886.0	5.266311	9.946834	0.062304	0.513670
1989	190.6	12 138.0	5.250177	9.404096	- 0.016134	- 0.542738
1990	194.0	12 225.0	5.267858	9.411238	0.017681	0.007142
1991	197.9	21 996.0	5.287762	9.998616	0.019904	0.587378
1992	209.6	67 813.0	5.345201	11.12451	0.057439	1.125893
1993	216.3	119 147.0	5.376666	11.68811	0.031465	0.563604
1994	227.2	97 245.0	5.425831	11.48499	0.049164	- 0.203124
1995	239.2	173 578.0	5.477300	12.06438	0.051469	0.579393
1996	260.7	106 524.0	5.563370	11.57613	0.086070	- 0.488257
1997	272.3	106 531.0	5.606904	11.57619	0.043534	6.57E - 05
1998	284.4	120 420.0	5.650382	11.69874	0.043477	0.122550
1999	295.2	129 000.0	5.687653	11.76757	0.037271	0.068827
2000	301.4	148 314.0	5.708438	11.90709	0.020785	0.139519
2001	314.1	176 174.0	5.749711	12.07923	0.041273	0.172140
2002	329.1	168 804.0	5.796362	12.03649	0.046650	- 0.042734
2003	343.3	227 611.0	5.838605	12.33539	0.042243	0.298900
2004	366.6	225 000.0	5.904271	12.32386	0.065667	- 0.011538

说明:数据资料由 1982 - 2005 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三、实证分析

如果直接对取自然对数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很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的情况,影响到所分析问题的准确性,所以,在验证各变量的协整关系之前,有必要先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一)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利用 Eviews5.0 软件,对 LnPI_t、LnFDI_t 的单位根进行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根据各序列的形态,对各序列都采用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检验,最大滞后期采用 SC 准则确定,差分序列的检验类型按相应原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样本区间:1981 - 2004)

变量	检验类型 (C,T,K)	ADF 检验	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检验结果
			1 %	5 %	10 %	
LnPI _t	(C,T,1)	- 3.2361	- 4.4407	- 3.6329	- 3.2547	不平稳
LnFDI _t	(C,0,1)	- 2.0100	- 3.7529	- 2.9981	- 2.6388	不平稳
ΔLnPI _t	(C,0,1)	- 3.6004	- 2.6743	- 1.9572	- 1.6082	平稳
ΔLnFDI _t	(0,0,1)	- 3.7764	- 3.7696	- 3.0049	- 2.6422	平稳

说明: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是否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

从表 2 可看出,LnPI_t、LnFDI_t 的 ADF 检验的 t 统计量分别为 - 3.2361 和 - 2.0100,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0.01、0.05、0.1 时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序列 LnPI_t、LnFDI_t 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序列 LnPI_t、

此结论较为可靠。

四、基于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能进一步细化探索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下面将利用 Sims 提出的向量自回归 (VAR) 技术进行方差分解和技术冲击反应来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

(一)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 VAR 模型中这种来自随机扰动项(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它能够比较客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图 1 是基于 VAR(3) 和渐近解析法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在下列各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的计算值,两侧的虚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在模型中,将冲击作用的滞后期设定为 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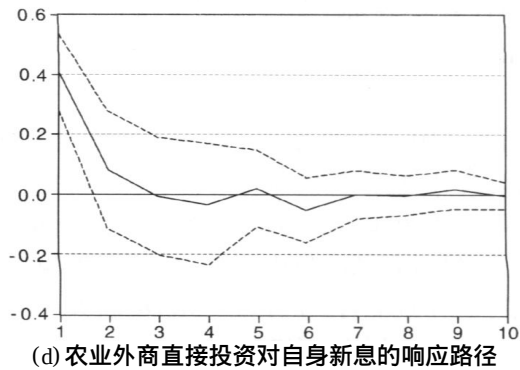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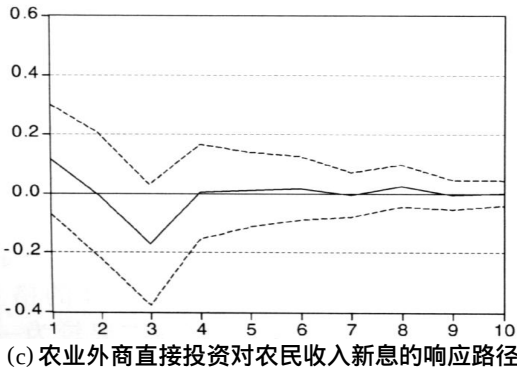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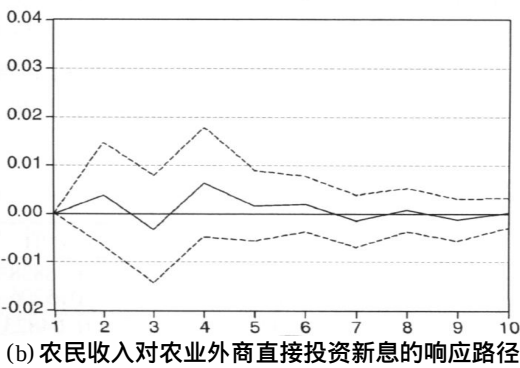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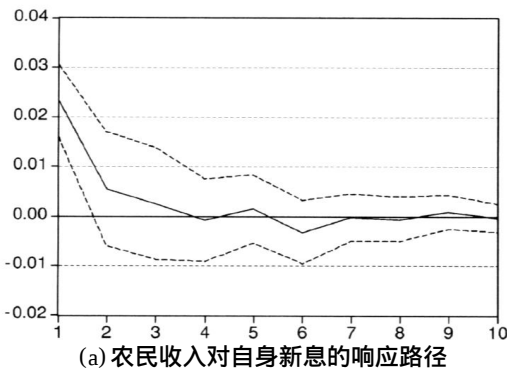


图 1 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图 1(b) 是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引起的农民收入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 1(b) 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农民收入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即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在开始的 1 - 2.5 年内,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响应,第 2 年正响应最大,随后出现负向响应,且负响应在第 3 年达到最大。此后,产生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正向响应,第 4 年出现强度更大的正响应,最后呈现出稳定的、程度持续减弱的交互响应收敛迹象。这一现象说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密切的关系,在短期内,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响应显著,但同时也产生了部分负响应;从长期来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时效较长,但强度较弱,这与前面的协整分析结果相吻合。其背后的经济含义是:由于受中国农业投资环境以及有效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缺乏等因素的制约,外商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很难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导致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短期行为强,这种短期行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长远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会产生持续的强度较弱的正效应,这说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起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还很弱。因此,中国农业领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政府在扩大农业领域利用外资的规模时,不宜采用急功近利的直接行政干预手段,而应当考虑采取长期政策,引导外资的合理流入。

图 1(c) 是农民收入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引起的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 1(c) 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农民收入增加),在前 1 - 2 年呈现强度渐弱的正响应,第 2 年响应为零,2 - 4 年出现了部分负响应,第 3 年负响应达到最大,第 4 年后呈现稳定的、强度较弱的正向响应收敛迹象,这说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短期内农民收入增长有利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长期内这种作用较弱。

图 1(a) 和 图 1(d) 分别是农民收入和农业外商

直接投资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引起自身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 1(a) 中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前 4 年呈现强度逐渐减弱的正向响应,第 4 年响应为零,随后呈趋于稳定的、强度较弱的正向响应收敛,这表明当前的农民收入水平与其滞后值的正向关联性持续时间较长,且趋于稳定。从图 1(d) 中可以看出,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前 3 年呈强度减弱的正响应,第 3 年后开始趋于稳定,这说明当前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其滞后值具有弱关联性。这与

目前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短期性的解释相一致。

(二) 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其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了解各随机扰动项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描述了冲击在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见表 5。

表 5 $\Delta \ln FDI_t, \Delta \ln PI_t$ 方差分解						
时期	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差分解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方差分解		
	预测标准误差	$\Delta \ln FDI_t$ (%)	$\Delta \ln PI_t$ (%)	预测标准误差	$\Delta \ln PI_t$ (%)	$\Delta \ln FDI_t$ (%)
1	0.0422283	92.50470	7.495304	0.023200	100.0000	0.000000
2	0.0430004	92.71421	7.285786	0.024154	97.35186	0.004785
3	0.0463374	79.85810	20.14190	0.024499	95.61179	7.450145
4	0.0464618	79.95069	20.04931	0.025351	89.40473	7.646370
5	0.0465181	79.93073	20.06927	0.025443	89.07913	7.653859
6	0.0468478	80.07601	19.92799	0.025727	88.74963	7.655480
7	0.0468510	80.06608	19.93392	0.025773	88.44190	7.677783
8	0.0469238	79.82475	20.17525	0.025792	88.37405	7.680480
9	0.0469542	79.82476	20.15724	0.025837	88.17353	7.680986
10	0.0469571	79.84516	20.15484	0.025840	88.17035	7.681090

从表 5 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的波动在第 1 年仅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波动的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在第 2 年才显现出来,但冲击影响较弱(仅占 2.6481%),在第 4 年以后冲击影响基本稳定在 10.5%~11.8%之间;农民收入增长波动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逐步减弱,在第 4 年以后冲击影响稳定在 88.1%~89.4%之间。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从第 1 期起就受到自身波动和农民收入增长冲击的影响,且受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要小于自身波动的影响,随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呈下降趋势,第 3 年以后冲击影响稳定在 79.8%~80.0%之间;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受农业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的影响呈波动式上升趋势,从第 3 年开始冲击影响基本稳定在 19.9%~20.1%之间,这与上述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1981 - 2004 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了农业外商直接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协整检验显示,从长期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农民收入增长关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系数为 0.1926,即农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民收入相应增加 0.1926 个百分点。这表明,从长期来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

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正相关,但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脉冲响应函数显示,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呈现正向响应,这种响应在长期内程度较弱,这说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农民收入增长与其自身滞后值呈较强的关联性,而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其自身滞后值呈弱关联。

以上分析表明,保持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协调性十分重要。要在长期内充分发挥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促进农业外商直接投资行为的长期化和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农业的市场吸引力。国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内资的作用,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自身素质,为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外部条件。二是进一步加大农业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扩大农业利用外商投资领域。农业利用外商投资不能只停留在生产领域,还应该进一步向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流通市场开放,通过两头带动中间。三是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使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四是加快农业领域的立法工作,出台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又能有效保护和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农业部门进行

有效引导和监督。

注释: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78 - 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农村经济绿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宋元梁、肖卫东:《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9),第30~39页。

参考文献:

1. 黄祖辉、吕立才:《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第1~5页。
2. 熊启泉、邓家琼:《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前景及农业开放的战略转变》,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12),第49~55页。
3. 秦富等:《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研究》,载《农业经济问题》,2002(1),第42~47页。
4.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

及实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 易丹辉主编:《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6. 王锡桐:《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问题及对策》,载《经济体制改革》,1999(5),第95~98页。

7.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载《金融研究》,2000(3),第103~110页。

8. 綦建红、王平:《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载《财经研究》,2007(2),第100~107页。

9. Blonigen, B. A., 2005.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 NBER Working Paper, 11299.

10. Beata, Smarzyska Javorcik, 2004.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ashville, No. 6, Vol. 94, p. 605.

11. Mina, N. Balamounie - Lutz, 2004. "Does FDI Contribute to Economic Growth?" Business, Washington, No. 4, Vol. 39, pp. 49 - 57.

12. Sims, C., 1989.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48(1), pp. 1 - 49.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长沙 414006)
(责任编辑:K、S)

(上接第26页)检验经济学理论时,它才成为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艺术,而经济学分析方法也会变得有用,不再只是好玩。^⑩虽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超越研究者的个人局限,也能够包容个人的性格偏好,但经济学在过去没有,在未来也不可能发展出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要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应该说,实证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唯一选项。……那些来自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并被积淀下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价值的、心理的因素在逐渐被认识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性,它们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代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法论趋势。^⑪

注释:

⑩ 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怎样成了一门“数学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察》,载《南开学报》,2005(5)。

文建东:《论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载《江汉论坛》,2006(4)。

田国强:《现代教训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载《经济研究》,2005(2)。

李树:《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扩张》,载《江汉论坛》,2004(5)。

陈美衍:《经济人与经济资源稀缺性》,载《江汉论坛》,2006(9)。

东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现代经济学发展》,载《东岳论丛》,2004(1)。

许旭红:《经济学演绎主义方法论述评》,载《江汉论坛》,2005(2)。

⑪ 杜金沛、李林:《经济学建构思想的纷争与科学主义的渊源》,载《当代经济科学》,2006(4)。

莫尼、通斯塔编:《哈维尔莫选集》,中文版,15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保罗·A. 萨缪尔森、威廉·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中文版,12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⑪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册,84页,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8。

⑫ 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20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⑬ 周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嬗变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4)。

⑭ 郭立焕等:《高等数学》,中文版,30页,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⑮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中文版,3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⑯ 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见A. S. 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⑰ 石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学》,载《江汉论坛》,2006(1)。

⑱ 蒙莱汉姆·罗森:《数学方法足以研究经济生活吗?》,载《学术月刊》,2006(5)。

⑲ 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中文版,68~69、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⑳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㉑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9)。

㉒ 胡进:《论经济学范式运动的三种方式》,载《江汉论坛》,2004(10)。

㉓ 杜金沛、邢祖礼:《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载《财经研究》,2005(12)。

㉔ 李宪徐:《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载《江汉论坛》,2006(7)。

㉕ 蒙莱汉姆·罗森:《数学方法足以研究经济生活吗?》,载《学术月刊》,2006(5)。

㉖ 戴维·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中文版,31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N、W)